

中國教會在轉變社會中所面臨的挑戰

張士江

前言

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一日，教宗爲中國天主教建立聖統制，劃分全國爲一百三十七個教區；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中國國民黨政府從南京撤退，除宗座公使和蘇聯大使之外，各國外交使團一同撤離。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宣告成立。從此，教會與中國共產黨進入了面對面的交往時期。

一九五一年九月五日，宗座駐華公使黎培理總主教被驅逐，一九五二年梵蒂岡與台灣建交。一九

五四年十月七日，庇護十二世發表通諭，譴責中國政府。在一九五零年代，外國傳教士陸續被驅逐出中國。

一九五七年，中國天主教愛國會成立，一九七七年，中國對外開放，中國開始發生歷史性轉變。一九八零年，中國天主教主教團在北京成立。期間一九六零至一九七零年代，中國天主教會的歷史基本空缺。

從一九五零年代的「反帝愛國運動」到一九八零年代的改革開放，直到今天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

時期，中國的政教關係，中梵之間、中國政府和中國地方教會之間，經歷了從敵視到對話，從誤解到了解，從衝突到嘗試適應，並學習彼此接納的這樣一個艱難、複雜、漫長的歷史過程。當然，由於種種原因，中梵之間的外交關係始終沒有解凍。

目前，中國教會正處身於一個快速轉變的社會環境之中。中國社會的轉變，出現的新問題，既為中國天主教會帶來了發展機遇和空間，同時，也帶來了挑戰，嚴重地挑戰著中國教會及其發展。中國教會如何回應中國社會，與社會大眾同行。這既是任務，也是新課題。

當代中國社會和教會的轉變

近年來，隨著中國一如既往地堅持改革開放的政策，中國成功地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同時積極籌辦二零零八年奧運會，並越來越多地參與國際事務，融入國際大家庭，承擔國際責任義務。中國不

但獲得了快速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而且也樹立了新的國際形象。在這樣的形勢氛圍之下，中國的宗教政策不斷得到落實，政府和教會雙方都出現了新的變化。在中梵之間、在中國政府和地方教會之間，一九五零年代的敵視態度和對峙氣氛今天已經大大緩和。這是中國社會快速發展，政教雙方不斷轉變的結果。當然由於中梵沒有外交關係，雙方無法直接交流溝通，導致彼此之間的一些誤會，甚至衝突仍有發生。即使這樣，中國的政教關係前景仍然樂觀。下面的幾個事件說明了政教雙方的微妙變化。

一九九九年中梵談判啓動，中央政府制訂新時期宗教工作的方針。二零零零年一月六日北京祝聖五位主教，引起羅馬教廷抗議；同年十月一日羅馬冊封一百二十位中國聖人，引起中國政府強烈抗議。二零零一年十月二十四日，在羅馬舉行的一個紀念利瑪竇抵達北京四百週年的研討會上，教宗為教會在中國過去的過錯請求寬恕和原諒。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時任國務院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的潘岳發表「馬克思主義宗教觀必須與時俱進」的文章，對宗教做了客觀正面分析，受到宗教界和學術界好評。

二零零一年十二月十日，在全國宗教工作會議上，前國家主席江澤民指出了「宗教存在的長期性特點」，強調要「發揮宗教中的積極作用」，認為「要了解當今世界，必須了解宗教」。二零零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面對中外記者和來訪的布什總統，江澤民主席在電視鏡頭前公開表示，自己對宗教問題非常感興趣，還曾閱讀過《聖經》等宗教經典。

二零零三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國天主教愛國會常委會和中國天主教主教團聯席會議，審議並通過了「三個文件」引起各方關注。二零零四年九月，中央提出「構建和諧社會」的任務，宗教也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力量。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八日，國務院頒佈《宗教事務條例》，二零零五年三月一日正式實施。新條例從法律上將宗教團體視為民間組織

(NGO)，中國社會團體的一員，屬於伙伴關係。當然，《條例》指明，公民自由信仰或不信仰宗教的權利依法受到保護。新條例被海外視為中國社會邁向成熟、健康發展的一個標誌。當然，最近幾年，中國一些教區及堂區也出現了嘗試修和，聖事共融的積極現象。

從北京方面不難發現，「一六祝聖」之後，中國大規模的集體祝聖主教事件明顯減少了，政府在處理主教人選的問題上更加小心謹慎，避免一窩蜂而上的做法。同時，逐漸重視顧及教會傳統。從羅馬方面「十一封聖」之後，宗座更加小心處理與北京之間脆弱的關係，盡量避免誤解衝突，努力考慮中國教會的實際情況，歷史傷痕，社會國情，雖然，中梵關係正常化未能夠在二零零零年前後完成，但是為誤解和隔離了半個世紀的中國和梵蒂岡來說，推遲一點時間來加深彼此的認識、了解，最終制定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機制，比起匆匆忙忙的建交而留下一大堆問題，更為務實重要。

中梵關係的三大挑戰

半個多世紀以來，因為「中梵關係」一直沒有正常化，所以中國教會無法避免地一直處於「中梵關係」的兩難夾縫之中。顯然，中國教會沒辦法專心致志，全力以赴地發展教會，卻在各種爭論之中耗費了大量的時間、人力、物力。事實上，從主教任命、教區劃分和愛國會問題上，不難發現「中梵關係」始終決定性地影響著中國教會及其發展。

主教的選拔和任命

由於中梵雙方沒有外交關係，沒有協商機制，發生在中梵之間的事件就相當敏感，足以強烈地衝擊中國教會和中國社會，尤其是選拔和任命主教問題。

一九八一年，鄧以明主教在海外被任命為廣州的總主教，一九九一年五月，龔品梅主教早在一九七九年被任命為樞機的秘密被公開，就是兩個突出

的例子。一般來說，按照《天主教法典》及教會傳統，在海外由教宗任命某國某一教區的主教很普遍，但對於沒有外交關係，誤解極深的中梵雙方，問題就沒有這麼簡單了。

這類主教任命在中國常被定性為政治問題，被視為外國勢力干涉中國內政，我們不妨暫時撇開任命本身，放下中梵雙方，單為中國天主教會考慮一下。一方是宗座及其任命，另一方是政府及其反對任命。一方公開任命，一方批駁抵制，這對當時的中國神長教友意味了什麼？既要做一名虔誠的神長教友，還要做一個好公民，如何表態？在中梵衝突中，透過任命和反任命，中國神長教友處於艱難夾縫之中，不同的態度導致內部紛爭，也就不足為怪了。

在中梵關係沒有正常化的半個世紀中，已經有很多中國公開團體的主教或主教人選通過各種途徑向宗座申報，大多數主教都獲得了教宗的秘密承認或任命。由於申報和任命都為秘密進行，中梵之間

也就沒有出現新衝突，中國天主教會也沒有處於這些危機之中，雖然，秘密上報和任命爲中梵雙方、爲中國地方教會來說，並不是好辦法，也不是解決之道，只是沒有辦法中的辦法，無奈之中的權宜之計。但中梵和中國地方教會三方都心知肚明，都在避免刺激任何一方。看來，徹底解決中國主教人選的選拔和任命問題，也只有等待中梵建交，協商一個三方都可以接受的途徑了。

教區的重新劃分和確認

中國現在有兩種教區劃分，一是一九四六年宗座在建立中國聖統制時，教宗爲中國提升的一百三十七個教區。另外一種是一九九八年，中國天主教主教團根據國家的行政區域而將全國劃分的一百一十五個新教區。難題就出在兩種教區劃分出現相互交叉的情況，導致一些教區歸屬產生混亂。

如果今天宗座沒有取消一九四六年的劃分，那麼教會法律上，這些教區還存在，而且，合乎教會

的《法典》。

困難的現實是，一些新教區在政府那裏合法，得到當地社會的認可，但按教會法律不合法。因爲中梵沒有外交關係，雙方一直沒有機會和途徑協商教區劃分問題，當然無共識可言。宗座只有保持原來的教區劃分，而中國政府則堅持按照行政區域劃分各地教區，但可憐的是處於兩難中的中國神長教友了，導致一些神長教友的教區身份不明確。

如果宗座想改變現狀，無論單方面公開宣佈保持一九四六年的教區劃分，還是宣佈廢除一九四六年中國內政的嫌疑，容易產生誤解。

即使宗座認識到教區劃分在今天必須調整，但苦於沒有外交途徑，如何進行協商？政府雖然可以用行政辦法，按照國家行政區域調整教區，但無法與教會法律保持和諧，就無法解決廣大神長教友的心靈平安問題，也就無法解決教區問題。

中梵不解決教區劃分問題，也就難於解決這些

教區內「地上地下團體」同時存在的混亂事實，也難以解決一些教區的主教繼任問題，地方教會無穩定可言。這是中梵都不願意發生的事情。爲此，這成爲今天雙方無法迴避，應積極面對的現實挑戰。

中梵關係正常化是關鍵

無論如何，中梵關係正常化不但爲中國天主教會十分重要，而且爲政教雙方都非常重要。

首先，爲中國天主教自身，中梵關係正常化才是解決中國天主教「地上地下」兩個團體紛爭的關鍵因素。目前，中國天主教會^{在修和方面}已出現的積極改變，就有賴於中梵關係的解凍。這是一個強烈的修和信號，一旦談判成功，中國天主教地上地下紛爭將劃上句號。顯然一切都將回到合法程序和法律途徑上來。

其次，中梵關係正常化勢必考慮討論選拔和任命主教問題，迫使雙方將這個拖了半個世紀的問題妥善解決。第三，中國的教區劃分合法化。第四，

妥善解決中國天主教愛國會與教區及其主教的關係。第五，多年來，某些國家和海外的人權組織一直以中國地下團體爲例，批評中國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和人權形象。但隨著中梵建交，問題勢必迎刃而解。

目前，雖然建交還沒有達成協議，但只要雙方坐到了談判桌前，討論有益於政府、宗座和中國地方教會的課題，準備建交，就是一個進步。即使談判暫時沒有成功，甚至還出現了「一六」的不協調和不愉快，這也很正常，因爲這些事件說明了中國政府和羅馬宗座雙方彼此了解還不夠，認識不深刻，建交的時機也許不成熟。所以，現實就要求雙方必須冷靜下來，多些理解、彼此原諒，避免走入極端，認真考慮彼此的信仰傳統與社會國情，接受對方爲合作伙伴，最終，妥善解決分歧。

一旦中梵邦交正常化，新政教關係將隨即轉變爲首要問題，如何調協未來政教關係，將是中國天主教會、中國政府和梵蒂岡三方的共同任務與挑戰。

中國教會努力回應社會

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確實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然而這種變化不僅在於經濟的持續增長和市場的日趨成熟，也包括社會結構的轉型、社會分層的變遷等等。比如有學者提出困擾著中國和影響著社會發展的七大社會問題和七大趨勢；特別是收入差距的進一步加大、貧困人口的增多、經濟快速增長時期的社會心態的變化，以及中國社會逐漸凸顯的老齡化趨勢、代際之間價值觀念的相互衝突等，日益引起了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

與這一背景相伴隨，思想的多元幾乎是不可避免的。應當說，這正是當今中國社會的現實。但是問題在於：多元的思想和不同的傳統，是否有可能在持守自身立場的同時，共同促成一個更為健全的社會？是否有可能借助各自的思想資源，為社會提供價值的指引？是否有可能通過積極的社會參與，對現實問題作出有效的回應？在我看來，這不僅是

社會發展對中國教會提出的要求，也是信仰本身的問題中應有之義。

近些年我們特別著力推動的，首先在於兩個方面：其一是「選擇窮人」；其二是參與學術，即回饋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的探索和期盼。

「選擇窮人」：關注社會弱勢群體

通過近二十年的快速發展，中國正成爲世界上增長最快的收入懸殊國家。由於地理位置、社會體制和開放先後等原因，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城鄉差距、東西部地區的差距日趨嚴重。這種差距有時還出現相互交叉、重疊的現象。比如，在中國的十三億人口中，有三分之二的人居住在農村或鄉鎮，城鄉收入差距又相當大，中國東部沿海地區開放早，發展迅速，所以，小康家庭很普遍。但中西部一些地區還很貧困，一些家庭的溫飽還成問題。這種差距狀況正威脅著中國社會的穩定和未來的發展。因此減少貧困，縮短差距，推動平衡發展，構

建和諧社會就成了中國政府和社會各界的共同任務。這些差距往往是產生社會弱勢群體的原因。與此同時，由於中國社會福利體制尚不完善，中國的弱勢群體的問題就更加突出。

多年來，中國的人口增長一直是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所以，從一九八零年代起，中國政府實行了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今天，雖然中國的人口增長有所控制，但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家庭結構比例的特殊性。

研究資料顯示，目前中國六十歲以上老年人有一億三千萬，約佔總人口的百分之十點二，已提前進入了老齡化社會，在社會人均收入不高的情況下，老年人的養老、醫療、照顧、社會活動、心理輔導等問題日突顯。雖然大多數的中國老年人有家庭，不是孤苦無依，也沒有流落街頭，但由於中國家庭的特殊結構，老年人成了一個孤獨的社會弱勢群體。所以，中國教會開辦老人院，提供安老服務是回應中國社會需要的良好途徑。

目前，艾滋病已經成爲人類社會的共同敵人，艾滋病患者是今日新的社會弱勢群體。中國的艾滋病病人由於很多沒有醫療保險，所以境況更糟。當前，中國艾滋病增長率已經躍升至亞洲的第二位，防治艾滋病的任務十分艱巨。

爲了回應社會的需要，「北方進德」於二零零二年十二月成立「希望之光」防治艾滋病辦公室。教會的這種服務嘗試，一度並不爲社會認同和接受。

從二零零三年十二月溫家寶總理作爲第一位國家領導人首次到北京地壇醫院探訪艾滋病病人，到二零零四年國家主席胡錦濤到北京佑安醫院慰問艾滋病患者，再到二零零五年二月八日農曆新春前夕，溫家寶親臨中國艾滋病重災區河南省上蔡縣慰問患者和遺孤，無不說明了中國國家領導人對艾滋病峻形勢的高度重視，同時號召全社會要接納艾滋病患者，要共同合作，攜手防治艾滋病。

這樣，隨著中國社會的轉變，政府對艾滋病問題的高度重視，國家領導人的身體力行，使人們對

防治艾滋病的緊迫性及重要性有了深入的認識。因而，教會開展這種服務得到各界人士的接納和重視。過去兩年，中國各地的修女們積極關注艾滋病問題，舉辦培訓活動，北方進德還組織修女到北京、河南和河北慰問艾滋病患者。目前，中國教會希望與政府醫療部門合作開辦照顧艾滋病患者的機構。

在世界各地，照顧社會弱勢群體一直是教會的優先選擇和優良傳統。在中國社會的轉型時期，對中國的發展趨勢和所面臨的問題，中國教會要及時回應，發揮自身優勢，作光作鹽，在強化倫理道德教育，淨化社會風氣方面起到積極引導作用；同時，在救死扶傷、扶貧助教、幫助社會弱勢群體方面更要身體力行，積極參與，共同推動社會的平衡發展，為此，中國教會成立了一些像「北方進德」天主教社會服務中心這樣的非政府組織，中國基督新教早在1984年就成立了「愛德基金會」，為中國社會作出了貢獻。截止到二零零四年七月十五日，中國天主教各地開辦有老人院三十八家，診所或醫院一

百零三所、幼兒園十四個、殘嬰院十個。同時，幾十位修女正在中國各地十多家麻瘋病院中服務。

參與學術：回應中國知識份子的期盼

通過改革開放，中國從貧窮落後中走了出來，創造了經濟奇跡。世界目睹了中國的轉變。但在快速發展的過程中，傳統的價值觀念受到挑戰，中國文化出現了新的斷裂，伴隨著商品大潮的拜金主義、享樂主義等思想侵蝕，使中國社會出現了所謂的「三信危機」（信仰危機、信用危機、信任危機）；誠信度下降、造假欺騙、貪污腐敗等等，甚至成為相當普遍的現象。正如清華大學萬俊人教授所說，中國在追趕現代文明的過程中「所面臨的困境也許不是技術和物質方面的，更主要、更艱難的，是在文化和精神方面。」

在當代中國，可能首先是一批人文學者對相關問題提出了敏銳的分析和批判。而由於人文學自身的性質及其對「意義」、「價值」等根本問題的探究，

學者們的研究必然向信仰和神學的領域逐漸延伸。因此在過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國社科院和各地大學相繼恢復和成立了宗教、文化和倫理道德研究機構，這些機構的學者經過不懈努力，對宗教以及相關的社會傳統倫理、道德、文化和社會問題做了大量研究工作，並翻譯、出版了大批涉及宗教、倫理、道德、文化相關的專著和論文。這些著作不僅僅是中國學者的興趣，而更是當代中國知識分子為中國的未來尋找出路所作的探索。他們的研究成果肯定了宗教的社會作用及其倫理價值，改變了中國社會各界對宗教的某些偏見。他們期望神聖的信仰可以淨化和改造社會風氣。

最近 Marshall Cavendish Academic Publisher 即將出版 *Religious Studies in China* 一書，其中收錄了二十位中國學者最具代表性的論文。編者楊慧林教授在該書前言中明確提出：「我們相信，神學應當成爲一種『公共話語』，爲人類提供意義和解釋；神學的話語可以在教會以外得到普遍的理解、論說

和尊重；神學的『公共性』最終會塑造一代『公共知識分子』，在神學的資源中闡發價值理想和社會正義。」

過去十多年來，中國學術界在基督文化方面的研究，碩果累累，然而，這些研究畢竟是從人文學的角度，從信仰之外的經驗入手。爲此，一些學者一直慨嘆教會缺乏研究人才，甚至不遺餘力地推動、鼓勵教會知識分子積極投身學術研究工作，從教會學、神學、牧靈學、靈修學和聖經學等層面展開研究，以豐富中國學術界的研究成果。

這些年來，中國天主教及基督教兩宗派正在國內外大學培養一批人才，其中一些已經回國服務。同時，他們也先後開設了碩士研究生班，北京成立「北京天主教與文化研究所」，河北省有「信德文化研究所」。中國教會正在逐步騰出人手，支持一代新人從事文化研究工作。希望走在前面的中國學術界能夠繼續推動、協助教會的學術研究，共同爲中國社會的發展做貢獻。

結語

雖然，普通的中國人都有一種樸素而濃厚的宗教情結，即尊重宗教、敬畏神明；但中國政府保護宗教合法權益，實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前提是宗教不影響國家政權和社會穩定。顯然，經過半個世紀的歲月滄桑後，中梵和中國地方教會三方都希望中梵關係早日正常化，以便解決一些棘手的問題，穩定社會，發展教會，樹立更好的國際形象。

但中梵關係正常化面臨著一個前提和一個關鍵。前提應是不反對政府，而關鍵則是主教任命機制。政府和教會選拔主教人選的標準各有側重：一個是俗世性的政治考慮，一個是屬靈性的聖召考慮（教會法律傳統）。在適應中國社會國情，尊重教會傳統的同時，建立一種協商機制，遴選雙方都可以接受的人選，也許才是目前中梵關係有望改善的理想結果。

從鴉片戰爭以來，中國基督宗教雖然在文化教

育、醫療衛生、農村發展、改變社會陋習及各種慈善事業方面為中國社會作出了卓越貢獻，中國民眾也沒有忘記這些，但是由於西方列強不平等條約的保教權，中國社會對中國教會的負面印象一直難以改變，歷史陰影揮之不去。

經過改革開放二十多年的努力，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人們的胸懷寬廣了，社會各界對宗教的態度也發生了轉變，中國教會的生存發展空間相應地得到了拓寬。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教會要抓住機遇，重塑教會形象，讓教會真正融入中國社會，與中國社會一起迎接挑戰，面對社會問題，回應社會的需要，用實際行動讓中國社會體驗基督的博愛精神，用愛心奉獻、言行證明中國教會可以與中國社會人群同行，可以為國家分憂解難，可以成為中國快速發展和轉變時期的合作伙伴，為中國的現代文明建設作出貢獻。□